

郑永年：

共同富裕的
宁波方案

【编者按】

本文系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、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名誉院长郑永年在《在宁波,读懂共同富裕(2022)》蓝皮书的序言。

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,也是全世界要破解的难题。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起伏的过程,没有一个社会可以保持永远的富裕,富裕程度随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。因此,共同富裕必须是一种包容式、开放式的发展。经验地看,要实现共同富裕,取决于是否能够处理好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,即企业、政府和社会的关系。

宁波从一个商埠小港,发展到如今的现代化滨海大都市,成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最高、收入差距最小的城市之一,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问题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。总结宁波共同富裕的实践经验,不仅对浙江、对全国有意义,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意义。

一、共同富裕是一种包容式、开放式的发展

共同富裕是一种理想,类似于古代人们向往的“大同世界”。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开放的,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应当是有方向的,因此这种理想状态的设定非常重要。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,不是均贫富。共同富裕要求实现基本的、人们可接受的社会公平与正义,但也承认社会差异。如果没有社会差异,社会就很难有进步,差异既是进步的产物,也是进步所要解决的问题。

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过程,需要通过发展来实现。但这种发展是一个动态的、包容式的发展过程,而非排他性的发展。一方面,已经实现了富裕的社会阶层,不应因为自己有钱了就垄断

发展、不向社会开放。另一方面,较不富裕的社会阶层,也应在这种开放中感觉到自己是有可能得到发展的,而不会因为自己较不富裕的现状而仇视富裕阶层。

在这一点上,西方社会的教训启示非常深刻。20世纪80年代以后,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迅速,全球化和信息化成为时代特征。但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并没有公平惠及普罗大众,国家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的结合更是赋权资本,导致社会越来越分化,美国从以往“中产阶级”演变成为“富豪社会”。由此可见,经济发展不见得就能为社会创造稳定,关键在于这种发展是否是开放的、包容的发展。

二、共同富裕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

社会是一个道德共同体,社会成员之间要互相信任。一个社会如果贫富过度分化,社会共同体就容易解体,财富增长不见得就会带来社会稳定,一个不稳定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。经济与文化、经济与道德都要均衡发展,经济发展需要以社会稳定为基础,经济发展最终也是为了社会发展,因为社会的主体是老百姓。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分配,而是为了进一步的经济发展。因为只有通过可持续发展,才能把中等收入群体做大做强。

中国政府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,关键就在于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,加快建设消费型社会,

促进经济增长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型转变。建设消费社会,必须建立一套有利于扩大内需的制度政策,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、兜底救助、住房供应和保障等体系。

中等收入群体是财富的主要载体,是消费的主力军,消费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壮大,也是实现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。一定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和合理完善的社会制度体系,是消费社会的两大支柱。市场机制是创造财富最有效的机制,它可以产生一个中等收入群体,但不能保护这个群体,因此需要完善的共同富裕制度政策体系加以保障。

三、实现共同富裕推动公平社会的主要思路

首先,“上不封顶”。创造财富没有上限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大陆的发展比日本和“亚洲四小龙”还快,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不如它们高。改革开放让中国找到了一个创造财富的机制,但还要继续探索保持财富、财富增值的机制。要鼓励创新,用法治与规则去管理科技创新,而非用任何运动式的方法。鼓励高科技公司搞科技创新、积极进入国际市场竞争。从国家利益出发,以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去寻找监管措施,培养更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经营者。

其次,“下要保底”。保底包括两个方面:一是要保障民生。医疗、教育、住房,这几块不是属于单纯的经济领域,是社会属性很强的民生领域,要

深化医疗、教育、住房领域的改革。二是要解决城乡问题。解决中国城乡问题,一定要双向流动。中国为了解决“三农”问题,投入了大量的资本、人才和物力,但是农村存在着单向性流出的问题。如何使城市上中阶层跑到农村去,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双向流动,就是现在要解决的问题。

最后,“做大中产”。“十四五”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,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,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。其实,“橄榄型社会”前些年已经提出来了,这几年又强调了,确实是要作为一个主要议程来做。中等收入群体强大了,有恒产者有恒心了,一个社会所有方面都会改善。

四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是公平分配的关键

民营经济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提供了大部分的社会就业,是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,也是参与全球产业链竞争的重要力量。在许多经济体尤其是东亚经济体,中小企业是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最主要力量,有助于改善产业结构,塑造中间大、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,最终实现共同富裕。

宁波是民营经济强市,中小企业众多,每20个人就拥有一家企业,每8个人中就有一个企业主,民营经济贡献了城市85%的就业岗位,吸纳就业人口达420万人以

上,是稳定就业的“压舱石”。宁波之所以成为全国发展最为均衡的城市之一,广大民营企业功不可没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民营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越是发达,社会就越公平公正。

当今世界,几乎所有强健的经济体都拥有一个庞大的中小企业群体。因此,要加快培养一大批对全球产业格局具有重要影响的技术型民营企业,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,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。

五、浙江宁波均衡发展在于处理好六对关系

包括宁波在内,浙江共同富裕的地方实践对全国和世界意义十分明显,其中均衡性是最显著的特征,关键在于处理好了六对关系。

第一,政府与市场的关系。呈现出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的特点,“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”体现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协调作用,宁波等城市的营商环境长期位居国内城市前列。

第二,国企与民企的关系。国企强,民企也强,两者之间进行了有效的劳动分工,这使得浙江能够有效动员和发挥民间资本的能动性,同时又能保障优质而充分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。

第三,内资与外资的关系。不排斥外资,但浙江的资本以内资为主,使得浙江的劳动关系更为和谐。浙江的“块状经济”,就是内资企业发展带动本地群众共同发家致富形成的结果,进而形成区域分工合作与均衡发展。

第四,大型企业与中小微型企业的关系。国内很多大型的民营企业都出自浙江,但同时浙江的中小微型企业也非常发达,从而为收入公平分配提供了重要的就业基础。

第五,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。浙江的服务业是为制造业服务的,尤其是宁波始终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制造业上,宁波的制造业单项冠军数量位居全国第一,从而为提高工资性收入奠定了产业链基础。

第六,工业与农业的关系。浙

江既是工业和制造业大省,也是农业强省,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成效显著,在城乡资源双向流动方面形成了不少有益的经验。

宁波是我的家乡,上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余姚四明山区,对农业农村发展有着切身的感受。中国农耕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衰,主要是因为一代代乡贤的“叶落归根”。一个理想社会应该是开放、包容的社会,而不是排他性的二元结构。通过“两进两回”等制度设计,鼓励和吸引城市居民回乡,既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发展,更可以减轻城市的负担。

宁波要率先实现共同富裕,四明山革命老区既是短板弱项,也是重点突破口。建议建立以民生GDP或者生态GDP考核为基础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,探索“两山银行”模式,实现生态资源向资产、资本的高水平转化,加大交通、科技、人才等要素资源保障力度,进一步理顺开发机制,推进资源统筹开发,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,强化土地改革试点力度,推动四明山区域建设成为宁波共同富裕的样板区。

总体而言,现在中国的主要问题还是需要继续把蛋糕做大,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之上把蛋糕分好,要走出中国自己的共同富裕道路。《在宁波,读懂共同富裕(2022)》智库报告把宁波作为案例来研究,为其他城市探索共同富裕的发展经验,具有重要意义。